
败者的逻辑：异化中的日本防卫安全观^{*}

张 勇 孟繁超

内容提要：作为战败国，二战后日本防卫安全观念的发展呈现出与别国迥异的特质，集中体现出败者逻辑，即从“拥抱战败”到“摆脱战败”。战后初期，出于对军事力量“失控”的疑惧，日本社会更为担忧“内部威胁”，形成了一定程度的自我束缚式安全观。一方面，日本强调法理规制，呈现出“法无授权不可为”的特点；另一方面，如何约束自卫队成为关乎日本防卫安全建设的核心命题。随着日本社会的威胁认知由内部转向外部，如何因应“外部威胁”被视作首要关切。立足于历史镜鉴的败者逻辑遭到“普通国家”信徒们的挑战，不再被视为日本防卫安全的金科玉律。尤其是在“安倍路线”下，“普通国家”意味着谋求政治与军事大国地位。日本防卫安全观念也日趋异化，战略精英们开始向历史中追寻军事强国理路。“女版安倍”高市早苗上台后，山县有朋式利益线思维呼之欲出，日本防卫安全观念加速走上返祖歧路。

关键词：日本防卫安全观 防卫战略 自卫队 利益线 国际秩序
高市早苗

作者简介：张勇，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孟繁超，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D831.3；E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874（2026）01-0057-2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近代以来日本对华认知的数据库建设及对华战略和行为研究”（编号：24&ZD310）。

在日本国家安全保障^①系统中，《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和

* 感谢《日本学刊》编辑部和匿名审读专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文中若有疏漏和不足概由笔者负责。

① 在日本安全研究与政策实践中，通常使用“安全保障”这一术语。参见：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鹿岛研究所编『日本の安全保障』、鹿岛研究所出版会、1964年；田中明彦『安全保障—戦後50年の模索—』、読売新聞社、1997年；鈴木基史『平和と安全保障』、東京大学出版会、2007年；遠藤誠治・遠藤乾編『安全保障とは何か』、岩波書店、2014年；千々和泰明『安全保障と防衛力の戦後史（1971—2010）—「基盤的防衛力構想」の時代—』、千倉書房、2021年；高橋杉雄『現代戦略論—大國間競争時代の安全保障—』、並木書房、2023年。

《防卫力量整备计划》为代表的“安保三文件”是其重要组成部分。^① 其中，防卫安全发挥着至关重要的支柱和保障作用，向上承载安全战略，向下延伸至军力规划。而防卫安全观念不仅支撑着防卫战略，更塑造着日本国家安全的思维方式。

关于战后日本防卫安全的演变，近年来国内外学界从不同角度进行了专门的探讨，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或聚焦最高层级的安全战略，或关注其演变动因与制约因素。围绕日本安全战略，中国学者立足日本内部动因，剖析其演变的内外规制，总结了战后日本安全战略“因应与调适”的特征，将日本安全政策演进分为安全保障自主化、国防正常化与军事大国化三重进程。^② 在制约因素层面，瑞典学者从和平学视角切入，论证“和平主义”对战后日本安全战略的塑造作用，直言“日本和平主义已死”。^③ 还有日本学者从法理维度指出，日本国内安全辩论呈现“法律论偏重”态势，形成“无政策效果的政策辩论”^④ 困局。针对法理突破，中国学者还对日本“新安保法”与“存亡危机事态”进行重点解读，阐释其对日本对外政策的深远影响。^⑤ 关于日本安全战略之下的防卫战略，学界亦有大量研究。中国学者以日本防卫战略文件为切入点，聚焦岸田文雄内阁时期日本防卫战略“由守转攻”的重大转向，^⑥ 认为日本摒弃“专守防卫”原则正为地区安全注入新风险^⑦。也有研究着力解析新“安保三文件”的内在关联，即“安全战略—防卫战略—军力规划”的层级体系。日本学者追溯了新“安保三文件”的演变轨迹，揭示出日本防卫构想从“防卫规划”向“军力运用”转型的逻辑。^⑧ 此外，还有研究聚焦防卫

① 千々和泰明「戦後史のなかの 2022 年安保三文書改定」、『安全保障戦略研究』2024 年第 1 号、1—14 頁。

② 参见于铁军：《因应与调适：战后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的演化》，《日本学刊》2023 年第 4 期，第 1—39 页；吴怀中：《战后日本安全政策的演变》，《国际政治研究》2015 年第 1 期，第 31—42 页。

③ Karl Gustafsson, Linus Hagström and Ulv Hanssen, “Japan’s Pacifism Is Dead”, *Survival*, Vol. 60, Iss. 6, 2018, pp. 137–158.

④ 中村長史「政策効果論なき政策論争を超える道」、『平和研究』2019 年第 52 号、79—97 頁。

⑤ 参见吕耀东：《日本新〈安保法〉的生效及其影响》，《和平与发展》2016 年第 3 期，第 64—67 页；吕耀东、鞠佳颖：《“存亡危机”及相关事态与日本对台政策取向》，《和平与发展》2023 年第 5 期，第 128—149 页。

⑥ 江新风：《日本防卫政策调整、动因及其影响分析》，《日本研究》2023 年第 1 期，第 12—23 页。

⑦ 孟晓旭：《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调整评析》，《国际问题研究》2023 年第 2 期，第 103—121 页。

⑧ 参见：千々和泰明「戦後史のなかの 2022 年安保三文書改定」、『安全保障戦略研究』2024 年第 1 号、1—14 頁；千々和泰明『安全保障と防衛力の戦後史（1971—2010）—「基盤の防衛力構想」の時代—』、8—12 頁。

省与自卫队的主体行为。中国学者围绕“文民统制”“自卫队入宪”等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① 日本学者就再军备、自卫队与战后体制、“吉田路线”与防卫政策等议题，进行了细致的讨论。^② 美国学者则剖析了自卫队组织架构与法理议题，梳理了陆上自卫队发展历程。^③ 与国内外学界在防卫安全领域卓有成效的知识生产相比，目前关于日本防卫安全观念演变的研究仍有拓展的空间。有鉴于此，本文将主要探讨日本防卫安全观念，阐释其在战后的变迁历程。

战后一段时期内，日本的防卫安全观念体现出法理规制与军力束缚的特征，呈现出一定程度的自我约束（self-imposed constraints）^④ 色彩。首先，日本防卫安全相关的政策辩论具有浓厚的法理色彩。当探讨防卫问题时，日本首要考虑的是完善相关法律，呈现出“法无授权不可为”的特点。此外，曾发动侵略战争的战败国身份让日本自卫队备受争议，尤其是自卫队与宪法的关系仍未明晰，在二战后一段时期内被视为“非必要之恶”，这意味着日本社会倾向于牺牲一定的军事合理性以束缚自身武装力量。然而，当前日本正致力于摆脱原有的“败者逻辑”，其防卫安全观念已发生严重异化。当前日本决策层推动防卫安全领域的突破，背离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⑤ 的基点，并背弃了“和平宪法”的承诺。进一步而言，日本防卫安全观念正浮现出返祖式的“利益线”思维，这一异化源于对战后“败者逻辑”的放弃，以及对“普通”防卫安全观的执着追寻。当“败者逻辑”被贴上“不正常”“不普通”的负面标签时，日本的安全决策层与战略精英们便在其历史脉络中向上追溯，并且自诩为追求“正常”的战略

① 参见方珂：《战后日本“文民统制”型政军关系的建立（1945—1954）》，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22年，第132—136页；张晓磊：《“自卫队入宪”法理问题探析》，《日本学刊》2018年第4期，第47—62页。

② 参见：大嶽秀夫『再軍備とナショナリズム』、講談社、2005年；佐道明広『戦後日本の防衛と政治』、吉川弘文館、2003年；中島信吾『戦後日本の防衛政策—「吉田路線」をめぐる政治・外交・軍事—』、慶應義塾大学出版社、2006年。

③ Robert D. Eldridge, “Organization and Structure of the Contemporary Ground Self-Defense Force”, in Robert D. Eldridge and Paul Midford eds., *The Japanese Ground Self-Defense Force: Search for Legitimac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7, pp. 19-57.

④ 2007年版“阿米蒂奇—约瑟夫·奈报告”指出了日本在防卫安全上的自我束缚特点。参见：Richard L. Armitage and Joseph S. Nye, *The U. S. - Japan Alliance: Getting Asia Right Through 2020*, CSIS, 2007, p. 22, https://csis-website-prod.s3.amazonaws.com/s3fs-public/legacy_files/files/media/csis/pubs/070216_asia2020.pdf [2025-12-10]。

⑤ 王毅：《胸怀天下，勇毅前行 谱写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华章》，《国际问题研究》2023年第1期，第1—11页。

思维。于是，山县有朋式利益线的返祖思维卷土重来，正如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及现任首相高市早苗都高呼“日本归来”（Japan Is Back）。^①但是，归来的却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和平国家”日本。

美国小布什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迈克尔·格林（Michael Green）在《利益线：安倍晋三时代的日本大战略》中，以山县有朋的“利益线”思维类比“安倍大战略”。格林声称，与山县有朋基于大陆思维的利益线主张不同，“安倍的利益线决定性地擘画在海洋上”。^②更有甚者，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被认为是“女版安倍”，其总体上延续“安倍大战略”，且愈加鲁莽和挑衅。高市早苗以首相的身份，在国会答辩中公然宣称“台湾有事”或将引发日本“存亡危机事态”。^③这与山县有朋之“利益线”思维如出一辙，高市早苗答辩蕴藏的潜台词就是把中国台湾地区纳入日本“利益线”之中。这是 1945 年日本战败以来日本领导人首次在台湾问题上表达武装介入的野心，首次对中国发出武力威胁，公然挑战中国核心利益。有关言论极其错误、极为危险，性质影响极其恶劣。^④

那么，究竟什么是“利益线”？日本前防卫大学校长、国际政治学者五百旗头真总结：所谓“利益线”，就是与“主权线”（本国领土）有密切关系的战略要地。在山县有朋看来，倘若“利益线”不保，则“主权线”不保；反之，要保“主权线”，需经略“利益线”。^⑤这种思维是扩张式的，图谋的是“势力范围”，谋求的是权力优势，寻求的是绝对安全。世人不禁要问，日本有何资格在本国领土主权外，宣称他国领土关涉本国特殊利益，这无疑反映出日本防卫安全观念之变。

当前日本防卫安全观念向战前“利益线”思维回归，既违反了其作为战

① 参见：Shinzo Abe and Jonathan Tepperman, “Japan Is Back: A Conversation with Shinzo Abe”, *Foreign Affairs*, Vol. 92, No. 4, 2013, pp. 2–8; 「週明け自民党総裁選告示へ 高市氏『JAPAN Is Back』掲げ『野党との連立』にも意欲 小泉氏は陣営発足式で決意表明…河野前デジタル相が支持表明」、『TBSテレビ』2025 年 9 月 20 日、<https://newsdig.tbs.co.jp/articles/-/2180801> [2025-10-24]。

② Michael Green, *The Line of Advantage: Japan's Grand Strategy in the Era of ABE SHINZO*,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22, p. 11.

③ 「台湾有事は『存立危機事態』高市首相、発言撤回せず」、『毎日新聞』2025 年 11 月 11 日、<https://mainichi.jp/articles/20251111/k00/00m/010/025000c> [2025-11-21]。

④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涉华错误言行阐明立场》，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网，2025 年 11 月 11 日，https://un.china-mission.gov.cn/czthd/202511/t20251122_11758149.html [2025-12-11]。

⑤ 五百旗头真主编：《战后日本外交史：1945—2010》，吴万虹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3 年，第 8 页。

败者对国际社会的承诺，也背离了日本“和平宪法”的基础。日本防卫安全观念的变迁，本质上是其战后“败者逻辑”的异化，是对日本战后“和平主义”的反叛。研究二战后日本的防卫安全观，须回溯其独特的发展演变过程。战后日本为何形成了独特的自我束缚式防卫安全观？这样的防卫安全观又如何异化为“利益线”思维的回潮？日本防卫安全观念又为何走上返祖歧路？鉴于上述问题，本文将全面分析日本防卫安全观念的两大关键特征，即“法理规制”与“军力束缚”，然后探讨其演变过程，即伴随日本认知的“安全威胁”从内部转向外部，其防卫安全观念亦显著异化，并在此基础上剖析这一异化背后的深层动因，即“败者逻辑”面临的挑战。

一、法理规制与军力束缚：冷战时期的日本防卫安全观

作为曾经发动侵略战争的战败国，日本在冷战时期的防卫安全观念体现出“败者逻辑”，长期围绕坚持所谓“法理规制”以及“约束军事力量”两大问题展开。而威胁指向的内部化，使日本形成了独特的防卫安全观。所谓“威胁指向”，即“何者构成威胁”。二战后初期，日本国内不仅面对外部威胁，更对内部威胁心存芥蒂。这意味着，自卫队非但不是理所当然的“必要之恶”，反而被视作“非必要之恶”，这在其他国家是难以想象的。在此背景下，日本形成了注重法理性的、“文民统制”的防卫策略。但是，伴随威胁指向由内而外位移，日本的防卫安全观念发生异化，这为“利益线”思维的死灰复燃提供了温床。

（一）自卫队：存在理由与法理“正当”

二战后的日本与他国不同，军事力量（自卫队）的存在并非理所当然。冷战时期，日本国内理想主义者大多倾向于质疑军事力量所起的作用，认为发展自卫队有悖“和平宪法”。因此，军力是否裨益国家安全，曾是这一时期日本安全观探讨的重大问题。鉴于二战的惨痛历史教训和战后“和平主义”精神，以东京大学教授坂本义和为代表的日本学界人士提倡“非武装中立”路线，批评甚至否定军事力量的作用。正因日本社会的“和平主义”与反军思潮的牵制，自卫队不得不为自身存在理由进行辩护。

从军种差异看，由于对旧陆军的反思，陆上自卫队背负了较重的历史包袱，需要向日本社会不断证明其发展非但不会威胁社会体制，反而能够对日本社会有所裨益。另外，陆上自卫队还需回应对“海洋国家为何需要陆上力

量”的质疑。20 世纪 90 年代，就有退役海上自卫队将领称“陆上自卫队没有存在的必要”。从其角度来看，只有在海上自卫队与航空自卫队失利后，陆上自卫队才会发挥作用；而且，唯有作为日本盟友的美国，才拥有强大的两栖登陆能力。^① 这意味着在一个海洋国家，陆上力量的作用令人产生怀疑。鉴于此，陆上自卫队必须对自身的存在价值做出回应。

另一方面，尽管日本四面环海，一段时期内，海上自卫队也需证明其存在的必要性与合理性。这源于“专守防卫”原则限制了海上自卫队的活动范围，使其受限于日本近海。如此一来，诚如美国海军“日本通”詹姆斯·奥尔（James Auer）总结的那样，海上自卫队与海上保安厅的职责趋同。^② 一直以来，成为“蓝水海军”、走向大洋是海上自卫队的夙愿。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通过与美国不断协商，日本海上自卫队确立了 1000 海里海上交通线的“中村防线”，形成了与美国海军职责分工的“内田主义”。^③ 基于此，海上日本自卫队完善了对自身战略任务与职责使命的界定。

在阐明日本自卫队存在必要性之争的基础上，还需要就其存在的法理问题进行必要的探讨。也就是说，日本必须首先在宪法与法理的框架内进行考量。在安全法理化过程中，日本形成了“法无授权不可为”的规范性原则。1947 年颁布的《日本国宪法》第九条规定：“（1）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2）为达到前项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④ 该条款明确规定日本禁止保留任何军事力量。然而，鉴于现实安全需求，日本试图维持一定规模的军事力量。为化解这一法理冲突，日本试图通过“自卫权”这一概念为其保有军力辩护。

① Paul Midford and Robert D. Eldridge, “Introduction”, in Robert D. Eldridge and Paul Midford eds., *The Japanese Ground Self-Defense Force: Search for Legitimac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7, pp. 3-5.

② 奥尔详细阐释了局限于近海的“海原愿景”。参见：James Auer, “Japan’s Maritime Self-Defense Force: An Appropriate Maritime Strategy?”,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Vol. 24, No. 4, 1971, pp. 3-20.

③ 所谓“中村防线”，是指一条从日本本土向南延伸至印度尼西亚北部海域的虚拟防线。之所以提出这一概念，主要是出于对日本能源安全的考虑。“中村防线”旨在应对日本对远洋能源的依赖，反映出海上自卫队在日本远海防卫方面的战略需求。所谓“内田主义”（Uchida Doctrine），是以日本时任海上幕僚长内田一臣的姓氏来命名的一种战略愿景，即海上自卫队与美国海军实现责任分工，专注于海上交通线的防御。参见：Naoyuki Agawa, *Friendship Across the Seas: The US Navy and the Japan Maritime Self-Defense Force*, Singapore: Springer Nature, 2023, pp. 29-30, 135-137.

④ 《日本国宪法（暂译）》，日本国驻华大使馆网，2020 年 4 月 1 日，https://www.cn.emb-japan.go.jp/itpr_zh/kenpo_zh.html [2025-05-05]。

诚如《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联合国任何会员国受武力攻击时，在安全理事会采取必要办法，以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以前，本宪章不得认为禁止行使单独或集体自卫之自然权利”。^① 自卫权可分为单独自卫权与集体自卫权，这也是关乎日本防卫安全的根本性问题。在1954年自卫队成立、日本内阁通过《自卫队法》《防卫厅设置法》时，“宪法第九条”所代表的“放弃战争”与“自卫权—自卫队”之间的法理关系素有争议，成为日本安全问题的症结。首先，内阁通过国会答辩重新界定“战力”，大幅缩小其涵盖范围。“陆海空军及其他战力……可以理解为从组织装备等方面看具备执行现代战争的大规模军事力量。”^② 可见，当时的日本内阁从相对规模角度定义“战力”概念。其次，日本历届内阁援引自卫权为军事力量辩护，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宪法第九条”的束缚。如宪法学者所言，其要义在于“自卫能力论”，即：自卫权是主权国家固有权利和生存权利；日本行使自卫权，是“必要且最小限度”的武力行使；自卫能力不属于宪法禁止的“战力”，因为战力指超出自卫所需、即“必要且最小限度”以外的实力。^③ 由此，日本形成了“自卫能力不等于战力”的“自卫权—自卫队”宪法解释。

在“自卫能力论”的基础上，日本确立了“自卫权发动三条件”：（1）日本正遭受紧急且不正当侵害；（2）别无他法可以应对；（3）仅能使用“必要且最小限度实力”。^④ 这些法理对自卫权行使和提升战争能力设置了壁垒。换言之，自卫权是最后手段（last resort），关键在于“必要且最小限度的实力”。在此法律约束下，日本长期奉行“专守防卫”原则。不仅如此，日本还形成了其他规范，例如，佐藤荣作内阁确立“武器出口三原则”，强调武器出口不得对他国构成威胁；在核问题上确立“无核三原则”，明确日本“无核国家”的属性。

（二）“文民统制”的多重规制：对自卫队的调控与监管

由于战前军国主义的倒行逆施，二战后较长时期内，相比“军队缔造和

^① 《联合国宪章》，联合国网，<https://www.un.org/zh/about-us/un-charter/full-text> [2025-12-20]。

^② 「第15回国会 衆議院 外務委員会 第4号」（発言番号032 木村篤太郎）、1952年12月1日、<https://kokkai.ndl.go.jp/simple/detail?minId=101503968X00419521201> [2025-11-08]。

^③ 常岡（乗本）せつ子「日本国憲法の平和主義と戦後責任」、『平和研究』第45卷、2015年、1—22頁。

^④ 「憲法第九条の解釈に関する質問主意書」、1985年6月25日、https://www.shugiin.go.jp/internet/itdb_shitsumona.nsf/html/shitsumon/a102047.htm [2025-11-06]。

平”，日本的国家安全更倾向于“抑制军队复辟的和平”^①。为此，日本形成了消极控制方针，以法律严格限制自卫队行动，尽量减少自卫队出动。其代价是牺牲所谓军事合理性和组织效率，但日本社会“两害相权取其轻”，愿意付出这一代价以限制军事力量。

第一，最重要的限制是政军关系控制。日本式政军关系有别于他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文官治军”（civilian control）是西方国家政军关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战后日本也不例外。在日文语境中之所以译为“文民统制”而非“文官治军”，是因为日本式政军关系的实质是政治家、自卫队和官僚这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

所谓“文民统制”，指文官（民选政治家）而非现役武官控制军事机构，至于“文官优位”则意味着官僚治军^②。其中，“文官优位”主要涉及自卫队武官（制服组）与防卫部门内设机构（简称“内局”）文官（西装组）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防卫厅奉行防卫参事官制度，在内局设参事官负责综合管理。内局文官不仅负责行政管理，还参与防卫政策制定。在冷战时期，防卫厅长官的平均任期仅九个月，^③因而实际政策的主导权掌握在防卫厅文官手中。此外，就指挥系统而言，自卫队最高指挥权属于首相，而防卫厅长官通过内局文官行使职权。尽管存在轻视军事合理性的意味，但防范“旧军复辟”是当时日本重要的考量。这也反映出，“文官优位”的原则与冷战时期的威胁指涉息息相关。据此，有观点断言，日本的“文官优位”更像是保护国家制度不受军队荼毒，而非实现高效的“文官治军”。^④

第二重限制是财政制约。20 世纪 70—80 年代，日本大藏省借调官员长期担任防卫事务次官，掌管防卫计划修订和预算分配；^⑤内局文官则以“年度预算”的方式限制与约束自卫队武官。一个更为典型的案例是，1976 年三木武夫内阁设置了防卫费开支不超过国内生产总值（GDP）1% 的上限。

① 日文为“軍による平和 軍からの平和”，参见：佐道明広『自衛隊史論』、吉川弘文館、2015 年、1—12 頁；辻田真佐憲『防衛省の研究』、朝日新聞出版社、2021 年、231—234 頁。

② 此处的“官僚”是通过国家公务员考试获得任职资格、不随内阁更迭的非民选官员。

③ Katsuhiko Musashi, “The Ground Self – Defense Force and Civilian Control”, in Robert D. Eldridge and Paul Midford eds., *The Japanese Ground Self – Defense Force: Search for Legitimac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7, p. 245.

④ Alessio Patalano, *Post – War Japan As A Sea Power*, 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 2015, p. 128.

⑤ Katsuhiko Musashi, “The Ground Self – Defense Force and Civilian Control”, in Robert D. Eldridge and Paul Midford eds., *The Japanese Ground Self – Defense Force: Search for Legitimacy*, pp. 248 – 249.

第三重限制是降格防卫部门。长期以来，防卫厅和防卫厅长官处于相对低位。在2007年1月9日升格为“省”之前，防卫厅为“厅”，低于其他“省”。实现升格后，防卫省才与其他“省”处于同等地位。

需要注意的是，即便在二战后一段时期内日本设置了上述多重束缚，但军国主义回潮的风险仍没能完全排除。譬如，1960年，陆上自卫队军官之子山口二矢刺杀了社会党委员长浅沼稻次郎；1965年，爆发了自卫队“三矢研究事件”^①。该研究会对朝鲜半岛“有事”进行推演，集中研究自卫队的因应策略。对此，社会党议员冈田春夫痛陈“文民统制缺位”，呼吁防止军国主义体制卷土重来。^②还有1970年爆发的“三岛事件”，日本右翼作家三岛由纪夫试图煽动陆上自卫队发动军事政变，未遂后自杀。^③上述事件加剧了日本社会对军事组织的戒备心理，相关民调数据也揭示了类似的趋势。《朝日新闻》舆论调查数据显示，1968年有64%的受访者反对修改宪法以保有正式军队，到1978年时，这一比例仍维持在71%—73%。^④1985年的另一项民调同样显示，在受访者中，58%的男性和60.9%的女性表示对自卫队不太信任或完全不信任。^⑤这再次印证，在战后很长时期内，军事力量本身及军国主义的卷土重来被视为一种威胁。

概言之，此时期日本防卫安全观念聚焦于防范内部威胁。特别是在左派和理想主义者看来，军事力量非但不是“必要之恶”，反而是“非必要之恶”与“税金蚕食者”。在此背景下，日本防卫安全观念形成了注重法理规制与自我束缚的特征，旨在严格管控自卫队行动、训练和权限。其代价是牺牲了组

① “三矢”一词有多种含义。一是“三矢”来自日本战国武将毛利元就“三支箭”的逸闻，象征陆海空自卫队联合作战的重要性。二是“三矢”中的“矢”在日语中与数字“八”读音相同，这暗示“三矢研究会”成立于昭和38年（1963年）。三是基于读音说，认为“三矢”意味着北纬38度线，而“三矢研究会”所设定的研究内容，就是针对朝鲜半岛局势紧张时日本的应对方案。参见：Robert D. Eldridge, “The GSDF During the Cold War Years, 1960–1989”, in Robert D. Eldridge and Paul Midford eds., *The Japanese Ground Self-Defense Force: Search for Legitimac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7, pp. 141–145; Katsuhiro Musashi, “The Ground Self-Defense Force and Civilian Control”, in Robert D. Eldridge and Paul Midford eds., *The Japanese Ground Self-Defense Force: Search for Legitimacy*, pp. 242–244.

② 「第48回国会 衆議院 予算委員会 第10号」（発言番号078 岡田春夫）、1965年2月10日、[https://kokkai.ndl.go.jp/txt/104805261X01019650210/78\[2025-05-05\]](https://kokkai.ndl.go.jp/txt/104805261X01019650210/78[2025-05-05])。

③ Robert D. Eldridge, “The GSDF During the Cold War Years, 1960–1989”, in Robert D. Eldridge and Paul Midford eds., *The Japanese Ground Self-Defense Force: Search for Legitimacy*, pp. 148–149.

④ 和田進『戦後日本の平和意識—暮らしの中の憲法—』、青木書店、1997年、128頁。

⑤ 同上书，第140页。

织效率，因此被揶揄为脱离现实的“神学论争”^①。日本之所以如此权衡，就在于试图换取对自卫队的管控。这反映出，特定时期内日本曾将军事力量扩张视为安全威胁，而这一理解源于对战前惨痛教训的省思镜鉴。正如瑞典和平学研究者所言，“冷战时期，一种观念在日本社会颇具共识。相较他国而言，日本更应当限制本国军备。这是一份独特的责任，而日本社会曾以此为荣”。^② 这一观点生动地揭示出，此时“败者逻辑”这一“看不见的手”支撑着日本社会的防卫安全观。然而，经历“因应与调适”^③，近年来日本逐步放松对自卫队的多重限制。接下来将聚焦日本威胁认知转变，探讨其对防卫安全议题所产生的影响。

二、由内及外：日本防卫安全“威胁指向”的变迁

冷战结束后，日本的防卫安全观念出现新转向。^④ 简言之，日本的威胁指向发生质变，从强调内部威胁转向外部威胁。随之而来的是，日本的防卫安全观念开始转向“如何应对外部威胁”，更加重视军事目的和军事组织效率。

冷战后日本防卫安全观的调适乃至异化，可被划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从冷战结束到 2010 年。该时期内，苏联解体、“海湾战争”、“9·11”事件等深刻改变了日本人的安全观念。有观点指出，日本安全保障中最大的挑战是缺

① 「成立『安保法制』9 条めぐる神学論争に終止符を 駒沢大学名誉教授・西修」、『産経新聞』2015 年 9 月 25 日、<https://www.sankei.com/article/20150925-MHTXNG6S5RKFRGNGKO63HCGJ3Q/> [2025-11-03]。

② Karl Gustafsson, Linus Hagström and Ulv Hanssen, “Japan’s Pacifism Is Dead”, *Survival*, Vol. 60, Iss. 6, 2018, pp. 137-158.

③ 于铁军：《因应与调适：战后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的演化》，《日本学刊》2023 年第 4 期，第 1—39 页。

④ 中曾根康弘时期日本虽然有一定“威胁外转”的倾向，但该时期没有对日本防卫安全观念、法理突破、军力束缚做出系统性调整，更没有从根本上撼动败者逻辑。相较于冷战时期，目前以中国为假想敌的日本显然走得更远，这亦反映在 2022 年《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中，日本视中国为“迄今为止最大战略挑战”。可以认为，中曾根时期总体上仍未脱离“吉田路线”。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拉尔·科蒂斯就曾指出，中曾根康弘本人亲身经历了军国主义浩劫，因而与大众印象中的“鹰派”形象相比，中曾根康弘对军事的看法或许更加复杂微妙。参见：Gerald L. Curtis, “Eulogy for Prime Minister Nakasone Yasuhiro”, *Asia-Pacific Review*, Vol. 27, No. 1, 2020, pp. 133-136。庆应大学教授森聪同样强调，中曾根“自主防卫论”蕴藏着复杂的战略思考，包含着对周边国家再保证的意味。参见：Mori Satoru, “Nakasone Yasuhiro’s ‘Autonomous Defense’ and the Security of Japan”, *Asia-Pacific Review*, Vol. 27, No. 1, 2020, pp. 50-79。

乏明确来源的“风险”。^①虽然这些“风险”没有明确的威胁来源，但它们无疑指向外部威胁。另一方面，朝鲜半岛问题、台海危机等所谓“周边事态”也引发日本的高度关注。由此，该阶段日本的防卫安全观念呈现出“外向化”和“普通国家化”之势头。二是从2010年到高市早苗执政。该时期内，日本国内的“中国威胁论”愈加甚嚣尘上，将中国明确定位为威胁来源。2022年底，岸田文雄内阁发布新“安保三文件”，其中《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公然将中国视为“迄今为止最大战略挑战”。^②高市早苗上台后，日本进一步贯彻落实“安倍路线”，开足马力推进强军目标。高市早苗政府由自民党与日本维新会联手撑起。《自维联合政府协议文件》载明，日本即将大幅强化“威慑能力”，加速强化“防区外打击能力”，提升“自卫队运用的组织化效率”。而且，为因应“战后最复杂安全环境”，将提前修订“安保三文件”。^③不难发现，高市早苗的上台执政，标志着日本整军经武的步伐将大幅提速。

这些变化显现出，日本防卫安全观念从关注内部威胁转向应对外部威胁。不论具有明确指向的威胁，还是来源未明的“风险”，皆属于外部威胁，而非“旧军复辟”这样的内部威胁，日本社会从恐惧军国主义复苏转变为担忧外部安全风险。客观而言，在日本防卫安全体系中，“法无授权不可为”的逻辑仍在发挥一定作用。自卫队一等海佐熊取谷行就曾指出，日本以法律严格管控军事行动、严格约束军事权限。在其看来，日本管理自卫队的方式与外国存在明显差异，这折射出“行政机关与军队”治理思路的不同。^④无独有偶，因倡导自卫队可进行“超法规行动”而被解职的日本前统合幕僚会议议长栗栖弘臣也认为，“自卫队是依据国内法规行动的行政机关”。^⑤但更应看到的是，日本当今的法理规制，本质上是一种“法理挡箭牌”，即以所谓程序正义代替实质正义。安倍再度执政以后，日本为因应“外部威胁”，采用“情境式立法”的做法，对即将到来的“冲突”进行分级预判，并在法律中详细规定

① 渡邊昭夫「日本はルビコンを渡ったのか？一樋口レポート以後の日本の防衛政策を検討する」、『国際安全保障』2003年第3号、73—85頁。

② 内閣官房『国家安全保障戦略』、2022年12月16日、<https://www.cas.go.jp/jp/siryou/221216anzenhoshou.html> [2025-05-05]。

③ 「自民党と日本維新の会、連立政権合意書」、2025年10月25日、<https://storage2.jimin.jp/pdf/news/information/211626.pdf> [2025-10-25]。

④ 熊取谷行・堀内智治・Andrew Duff「日本と諸外国の防衛法制の比較研究」、『海軍校戦略研究』2021年第1号、137—156頁。

⑤ 麓保孝・栗栖弘臣『自衛隊改造論』、国書刊行会、1979年、38頁。

具体的应对方式，旨在建立“无缝式安全保障法律体系”^①。而日本进一步完备法理体系的目的，正是使运用军事手段“有法可依”，从而服务于防范“外部威胁”这一战略目的。“威胁外转”所引发的战略性调整，集中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法理突破：程序正义代替实质正义

有关自卫权的法理问题，依旧是日本防卫安全中最根本、也是不能不回答的问题。在 2014—2015 年间安倍内阁出台“新安保法制”，实现了日本防卫安全在法理上的突破。安倍内阁对日本的安全保障体系进行了根本性的调整，其中最为重要的是颠覆了历届日本内阁有关自卫权的法律解释，解禁集体自卫权。对此，安倍内阁出台了新的“武力行使三条件”，放宽了自卫权的行使条件，从而为日本行使武力和执行军事作战创造了更为宽松的法律环境。

新“武力行使三条件”包括：（1）日本遭到武力攻击，或与日本关系密切的国家遭到武力攻击，威胁到日本存亡，从根本上对日本国民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构成明确危险。（2）为保护国家和国民，没有其他适当手段可以排除上述攻击。（3）武力行使限于必要且最小限度。^② 其中，第一个条件被界定为“存亡危机事态”，且构成了行使集体自卫权的法律依据，这标志着日本防卫安全领域的重大法律突破。关于“存亡危机事态”，有以下判定标准，即：攻击方的意图和能力，事件发生的地点、规模、形式以及发展过程，事件可能引发的影响，以及日本国民牺牲程度等。^③ 然而，看似严密的法律约束，却暗中服务于军事目的，为军事行动构筑一块“法理挡箭牌”。事实上，安倍内阁以来的立法均试图以形式上的正义掩盖实质性的非正义，然而形式正义终究无法遮蔽实质的不公。这尤其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法理挡箭牌”之功效，在集体自卫权的行使条件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亦即日本“因何种事态”以及“同哪些伙伴”发动集体自卫权。在集体自卫权发动对象上，美国是一个明显的协作对象。这意味着，一旦美国需要，日本不仅要提供后方支援，更要直接下场驰援。此外，高市早苗等日本政治家公然宣称，“台湾有事”关涉“日本存亡危机”。而这并非孤例，日本原首

① 内閣官房「『平和安全法制』の概要」、2015 年、<https://www.cas.go.jp/jp/gaiyou/jimu/pdf/gaiyou-heiwaanzenhousei.pdf> [2025-11-20]。

② 衆議院憲法審査会事務局「『安全保障』に関する資料」、「『存立危機事態』について」、衆憲資 2022 年第 101 号、17—18 頁、39—40 頁。

③ 同上书，第 40 頁。

相、现任自民党副总裁麻生太郎于2024年就在美国表示，“日本将台湾有事判定为存亡危机的可能性极大”。^①这无疑是在宣称，日本不仅考虑其本土安全，还要将中国台湾地区纳入其“利益线”范畴。这一错误认知为高市早苗在国会上发出挑衅性言论埋下了伏笔。

其二，法理突破使得“专守防卫”可被“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反击能力）所取代。2022年出台的新“安保三文件”中，明确了运用“反击能力”的原则。日本防卫决策层以“反击能力”之名，保有了对敌的进攻性能力，借此加强对假想敌的威慑力。所谓“反击能力”，实际上是以“惩罚性威慑”取代“专守防卫”。更应强调的是，日本试图操弄“反击”的定义，使之成为掩盖“先发制人攻击”的挡箭牌。

其三，法理突破使得自卫队在应对各种“事态”时能够做到有法可依。在日本防卫安全观念中，偏重强调假定情境来进行有针对性的立法。日本借助“情境式立法”进行预先规划，确保政策选项“有法可依”，在法理层面区分自卫队的“出动类型”；而且，根据不同的出动类型，又有相应的授权流程和武器使用标准。^②比如，鉴于现行法理的规制，“新安保法”试图解决应对“灰色地带事态”的法理困境。2013年版《防卫计划大纲》将“灰色地带事态”定义为“既非纯粹和平状态，亦非完全战时状态”的特殊情势，并指出“此类事态呈现长期化趋势，而长期化可能演变为更严峻的事态”。^③“灰色地带事态”烈度低于武力冲突，手段不限于武装力量，常以有限纷争形式显现。^④换言之，“灰色地带事态”是日本无法根据国际法规定的自卫权出动自卫队，而借助警察力量又无法因应的事态。^⑤所谓“灰色地带”概念，其

① 「『台湾有事は日本の存立危機事態』麻生氏 米国で抑止力強化訴え」、『朝日新聞』2024年1月11日、<https://www.asahi.com/articles/ASS1C56K6S1CUTFK004.html> [2025-11-01]。

② 参见：熊取谷行・堀内智治・Andrew Duff「日本と諸外国の防衛法制の比較研究」、『海幹校戦略研究』2021年第1号、137—156頁；『自衛隊法』、2025年法律第四十四号、https://laws.e-gov.go.jp/law/329AC0000000165#Mp-Ch_6 [2025-09-08]。

③ 内閣官房『平成26年度以降に係る防衛計画の大綱』、2013年、<https://www.cas.go.jp/jp/siryou/131217anzenhoshou/ndpg-j.pdf> [2025-12-22]。

④ Sugio Takahashi, “Development of Gray-Zone Deterrence: Concept Building and Lessons from Japan’s Experience”, *The Pacific Review*, Vol. 31, 2019, pp. 787-810.

⑤ 关于“灰色地带”，参见：德地秀士「平和安全法制の論議を振り返る—平和安全法制の効用と今後の課題—」、『国際安全保障』2019年第2号、20—38頁；神保謙「シームレスな安全保障体制への課題『グレーゾーン』事態からのエスカレーションを巡って」、『安全保障政策のリアリティ・チェック』、2016年、https://www2.jiia.or.jp/pdf/research/H28_Security_Policy/03-jimbo.pdf [2025-10-22]。

实明确指向了中国。日本出台“新安保法”，正是针对中国的合法维权行动，刻意聚焦所谓“灰色地带事态”，试图解决武装力量与警察力量在法理层面的协同运用问题。这也正是“无缝式安全保障法理体系”中“无缝”的核心要义——对华构建“无缝式威慑”。

也正因如此，安倍内阁要打造所谓“无缝式安全保障法理体系”，寄希望于实现法理突破，从而赋予自卫队开展军事行动时的程序正义。一言以蔽之，安倍内阁解禁集体自卫权，为应对所谓安全挑战提供“有法可依”的基础。如此一来，将“举证责任”^①转移到了指控方（包括在野党和日本民众）的肩上，这意味着在“枪口对外”时，法理突破成为日本政府逃避“举证责任”的工具。

（二）自卫队：从“非必要之恶”转变为“安全监护人”

随着日本防卫安全观念中的威胁认知由内向外发生改变，自卫队在日本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得到重新评价。自卫队逐渐“普通化”，^②从“着重训练”转变为“积极运用”。日本原内阁官房副长官助理、国家安全保障局副局长兼原信克称，“安倍再度执政以来为日本确立了‘正常’的政军关系”。^③换言之，在其看来，自卫队的地位逐渐合法化和正式化。更有甚者，当前执政的自维联盟，意图通过在宪法中“明记自卫队”的方式一举解决自卫队的法理地位问题，^④并借此使自卫队与其他国家的“军队”等同，成为安全领域中不言自明的存在。

而且，自卫队的对外行动任务亦有扩充。自 1991 年海湾战争期间以“国际贡献”为名实现首次海外派遣后，军事上的“国际贡献”成为自卫队的新角色。除国土防卫和灾害救援之外，军事上的“走出国门”成为自卫队的新任务。^⑤安倍内阁加速了这一进程，通过法律修改，自卫队获准从后方地带走向“非战斗现场”。在一系列法律放宽的情况下，自卫队获得了更大的行动空间，更畅通地“走出国门”，进行更大的“军事贡献”。对此，安倍内阁以

① 君島東彦「平和憲法の再定義—予備的考察—」、『平和研究』第 39 卷、2012 年、1—26 頁。

② エヤル・ベン・アリ「日本の自衛隊—普通化、社会、政治—」、『国際安全保障』2007 年第 3 号、73—94 頁。

③ 兼原信克「NSCの創設について—何が変わったのか—」、『国際安全保障』2022 年第 4 号、20—43 頁。

④ 「自民党と日本維新の会、連立政権合意書」、2025 年 10 月 25 日、<https://storage2.jimin.jp/pdf/news/information/211626.pdf> [2025 - 10 - 25]。

⑤ 額綱厚『暴走する自衛隊』、築摩書房、2016 年、135—138 頁。

“积极和平主义”为这一法理突破辩护，并暗示延续至今的战后“和平主义”是一种“消极和平主义”“一国和平主义”^①。

伴随日本社会对外部威胁的关注，“军队缔造和平”的理念渐趋固化。日本对自卫队的多重束缚开始减弱，军事合理性逐渐获得优势地位，自卫队军事行动面临的束缚有所缓解，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其一，“文官优位”受到挑战，服务自卫队“实战化”转型。从内局角度来说，内局官僚的代际变迁折射出“文官优位”原则下对自卫队行动限制的弱化。早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防卫厅内局文官主要由战前内务和警察出身的官僚担任，后来受到大藏省借调官员的领导，因而被揶揄为“殖民地”^②。然而，80年代后，出身于防卫厅的官僚逐渐崭露头角，并开始担任防卫事务次官等重要职位。这些由防卫厅培养的官僚不同于之前的“外部官员”，他们对自卫队有更深入的了解和亲近感，因此形成了一种“内幕一体”的局面。随着内局高层官员的代际更替，新一代内局文官更倾向于自卫队积极行动的方针，而非管制束缚的原则。^③

与此同时，现役武官与内局文官的关系也开始对等化。一个典型的例证是，2015年日本政府修订《防卫省设置法》，使现役武官与内局文官的地位变得更加对等，这标志着“文官优位”原则的虚化，自卫队武官获得更大的话语权。这一变化揭示出日本安全战略中对军事信息的需求有所上升^④，亦反映了日本社会对内部威胁的关注下降、对外部威胁的关注度上升。换言之，日本逐渐接受了威胁外转的逻辑，并着手打造“能战国家”。

相较而言，在1963年的“三矢研究事件”中，日本公众和在野党关心的焦点则是自卫队是否“失控”、文官对军队的控制是否到位，展现出对自卫队

① 参见：「『安全保障・国際協力・非常事態』に関するこれまでの議論」、2005年2月、[https://www.shugiin.go.jp/internet/itdb_kenpou.nsf/html/kenpou/chosa/shukenshi062.pdf/\\$File/shukenshi062.pdf](https://www.shugiin.go.jp/internet/itdb_kenpou.nsf/html/kenpou/chosa/shukenshi062.pdf/$File/shukenshi062.pdf) [2025-11-20]；北岡伸一『日米関係のリアリズム』、中央公論社、1991年、66—73頁、165—181頁。

② 辻田真佐憲『防衛省の研究—歴代幹部でたどる戦後日本の国防史—』、朝日新聞、2021年、150頁。

③ Musashi Katsuhiko, “The Ground Self – Defense Force and Civilian Control”, in Robert D. Eldridge and Paul Midford eds, *The Japanese Ground Self – Defense Force*, pp. 233 – 248.

④ 「第189回国会 参議院 外交防衛委員会 第17号」（発言番号003 渡部恒雄）、2015年5月28日、<https://kokkai.ndl.go.jp/#/detail?minId=118913950X01720150528¤t=1> [2025-06-10]。

的怀疑和担忧。^①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社会更加推崇军事目的和组织效率。例如，2006 年自卫队设立了“统幕监部”来取代原来的“统合幕僚会议”。“统合幕僚会议”以协调作用为主，而“统幕监部”则试图进一步整合陆海空自卫队，以增强各军种联合作战能力。^② 为配合驻日美军的改组、打造日美“一体化同盟”，自卫队还于 2025 年创设“统合作战司令部”，旨在加速推进自卫队“实战化”转型，继而强化对华军事威慑。^③

其二，军费得到实质性扩充。新“安保三文件”的出台标志着一个重要节点，岸田文雄内阁宣布从根本上强化防卫能力，承诺到 2027 年度将防卫费用占 GDP 之比提高到 2%，^④ 防卫省还把 2023 年定为“防御力根本性强化元年”^⑤。在此次军费扩张中，日本特别注重保持“反击能力”^⑥，在威慑领域投入大量预算。更有甚者，高市早苗甫一上台就宣称，将提前实现原定于 2027 年度完成的军费增长目标。^⑦ 这意味着自卫队可以保有更多的物质资源，将获得更大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进而在国家安全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其三，防卫部门地位提升。日本将防卫厅升格为防卫省，与其他中央机构实现平级。这意味着，防卫部门在日本政府体系中的重要性得到进一步确认。另一方面，自民党内防卫专家即“国防族”也不断变迁。这就是说，随着日本安全关切逐渐由内部问题转向外部挑战，国防议题在政治舞台上的重要性逐渐上升。为此，石破茂、小野寺五典等政治家将自己定位为“国防族”，以捞取政治资本、在政治上赢得更大的影响力。

此外，自卫队本身的角色也变得愈发“普通”，越来越向他国军队看齐。根据日美达成的协议，两国于 2006 年对彼此军力进行结构性调整。这次调整

① Robert D. Eldridge, “The GSDF During the Cold War Years, 1960 – 1989”, in Robert D. Eldridge and Paul Midford eds., *The Japanese Ground Self – Defense Force: Search for Legitimacy*, pp. 141 – 145.

② Naoyuki Agawa, *Friendship Across the Seas: The US Navy and the Japan Maritime Self – Defense Force*, Singapore: Springer Nature, 2023, p. 214.

③ 黄大慧、孟繁超：《战略锚定与战术调整：“特朗普冲击”与日美同盟“一体化”》，《外交评论》2025 年第 4 期，第 27—50 页。

④ 「岸田首相『防衛費 GDP2%、27 年度に』財源は年内決着」、『日本経済新聞』2022 年 11 月 28 日。

⑤ 防衛省「我が国の防衛と予算—防衛力抜本的強化『元年』予算—」、2023 年 3 月 29 日、https://www.mod.go.jp/j/budget/yosan_gaiyo/2023/yosan_20230329.pdf [2025 – 11 – 14]。

⑥ 「防衛力抜本的強化『反撃能力の保有へ』」、『自由民主』2022 年 12 月 13 日。

⑦ 「今年度の防衛費、GDP 比 2% 前倒し達成へ 補正予算案で積み増し」、『朝日新聞』2025 年 11 月 29 日、<https://www.asahi.com/articles/ASTCX4Q6QTCXUTFK00SM.html> [2025 – 11 – 30]。

的目标不仅仅在于驻地的改变，更重要的是自卫队与美军进行了更深层次的统合。自卫队以美军作为参照，围绕“互操作性”与美军在专业术语、计划、情报分享以及作战方面予以整合。更有甚者，正如希伯来大学埃亚尔·本·阿里所强调的，自卫队在法理性、公开化、脱历史罪责化、军事仪式、军事术语等层面^①日益趋近“军队”形态，其“普通军队化”的进程正加速推进。随着日本拥抱“以威慑求安全”的战略方针，自卫队“普通化”的趋势进一步显现。2025年《自维联合政权协议文件》要求“促进自卫队军衔、服饰、兵种与国际接轨”^②，“大佐”等战前军衔或将复活使用，其象征性意义不言自明。

综上所述，随着日本威胁指向由内及外转移，日本不再愿意以牺牲军事合理性和组织效率为代价来限制自卫队。而且，与之恰恰相反，在日本锁定中国为“迄今为止最大战略挑战”后，日本确立了“以威慑求安全”的方针，其防卫安全观念加速转变，更多地注重军事目的。尽管法理规制原则看似犹在，但仅能在形式上得到维系。自民党和日本内阁解禁集体自卫权，将“自卫权发动三条件”改变为新的“武力行使三条件”，降低了武力行使门槛。这代表着，程序正义代替了实质正义。在“安倍路线”下，日本更加注重为军事行动提供法理掩饰与法理依据。并且，日本通过情境式立法方式对多种情景进行预判，力图建立起无缝式法律体系，服务于全方位对华军事威慑。此外，虽然在宪法上仍未确立自卫队的“名分”，但日本社会对其法理规制与军事束缚日渐解禁，自卫队本身逐渐变得更加“普通”。

三、思维返祖：日本防卫安全观的异化

日本防卫安全观念的独特之处在于，一是安全问题的法制化，二是对防卫和军队角色的认识。那么，为何会出现这种在其他国家看来难以理解的现象？长期以来，为何日本愿意持续进行没有实际政策效果的辩论，愿意以牺牲军事合理性为代价？理解这一问题，是理解当下“利益线”思维在日本回潮的关键。日本防卫安全观念的异化，正是对其战后“和平国家”安全观念

① エヤル・ベン・アリ「日本の自衛隊—普通化、社会、政治—」、『国際安全保障』2007年第3号、73—94頁。

② 「自民党と日本維新の会、連立政権合意書」、2025年10月25日、<https://storage2.jimin.jp/pdf/news/information/211626.pdf> [2025-10-25]。

的掏空与背离，正是对“败者逻辑”的否认与篡改。

第一，再保证（reassurance）的逻辑。战后《日本国宪法》对自卫权和自卫队实施了严格的限制。作为一部“和平宪法”，它明确否定军队与战争能力，极力避免使用军事力量。^① 在“和平宪法”以及战争反思的基础上，战后日本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反军反战的“和平主义”文化。从再保证的角度看，这种“和平主义”的关键在于，战胜国与侵略者在战后的安全观念无法等同视之。^② 对于战败国或曰侵略者来说，其在安全上的重要举动，皆会受到其他国家的持续关注 and 质疑。因此对于日本安全战略而言，关系修复是战后重要的任务。^③ 在这种情况下，再保证的重要性显得尤为突出。^④

以“和平宪法”为代表的法理束缚，在本质上是一种再保证。“宪法第九条”代表着一种战败国对战胜国的再次承诺。也就是说，一方通过实际行动或政策举措，向相关方传递重要信号，强调其诚意和善意，以此消除对方的疑虑。此处之关键在于，无偿付出而非互惠行为。而且，行为体必须在一定时间内传递昂贵信号，以确保意图得到对方的清晰认知。由此，“宪法第九条”为代表的法理束缚，对于武力行使设定了极为严苛的约束条件，其目的在于消除战胜国对日本卧薪尝胆的疑虑。^⑤ 通过“和平宪法”，日本需要将“和平主义”内化为自身准则，通过自我限制来实现对胜利者的再保证。

第二，对政军关系失序的镜鉴。明治时代后直至二战，政军关系的失序是致使日本国内体制和外交政策全面失败的重要因素。军部和政党相互倾轧，争夺政策制定的主导地位。一方面，军方坚持“统帅权独立”的原则；另一方面，在当时的政党中，政友会为夺取政权，主动挑起“统帅权干犯”来抨击民政党。^⑥ 基于此，战后日本确立了“文官优位”的原则，这既是对战前

① 佐道明広「序章 近現代の日本外交と強制力」、『国際政治』2008 年第 154 号、1—11 頁。

② 石田淳「終章 輸入国際関係の限界」、大矢根聡編『日本の国際関係論』、勁草書房、2016 年、178—180 頁。

③ 同上书，第 179 頁。

④ Paul Midford, *Overcoming Isolationism*,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pp. 45–55.

⑤ 福島啓之「敗者の安心供与としての日本国憲法第九条一戦争放棄の起源一」、『国際政治』2019 年第 195 号、75—91 頁。

⑥ 商兆琦：《“无责任”的帝国——近代日本的扩张与毁灭 1895—1945》，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23 年，第 280 页。

军部重返政治舞台的提防，也表明了日本民众对政治家的不信任。特别是当“三矢研究事件”发生时，很难让人不联想起战前军部的“自导自演”行为。因而，社会党议员以“‘二二六兵变’前的军部”类比“三矢研究会”，旨在警醒日本社会。^①即，警惕战前军部擅自发动“事变”，以既成事实的方式，迫使日本社会和国际社会接受其倒行逆施。

第三，对军事力量有效性的反思。在二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日本社会对军事力量的有效性持怀疑态度，对军事有极强的否定性。“和平宪法”所保障的、和平主义与理想主义者所认可的原则是，战争不能够、也不应当作为一种政策工具。日本的和平主义者与理想主义者们，反对以“实力缔造和平”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式观点。在此基础上，他们尤其担忧“过度防卫”，提倡日本应该执行“非武装中立”的路线。^②例如，理想主义的旗手坂本义和曾认为，中立是一种可行的、有助于国家生存的理性策略，是一种防御性宣言。借此，日本可以降低两极格局对其之束缚，降低同盟中的“被迫卷入困境”。在坂本看来，作为中立者有助于使日本跳脱出安全困境的螺旋。^③此外，和平主义者与理想主义者指责现实主义是一种“大幻想”，谴责现实主义对均势、权力政治的痴迷。他们声称，现实主义建立在大国理性的假定之上，而这是一种虚幻的前提。在其看来，国际社会的真正出路在于对话与协调，而非仰仗武力。^④

然而，无论是再保证的逻辑、历史省思抑或理想主义观点，如今均已式微。这三者皆属于败者逻辑，是对侵略与战败历史的历史镜鉴。而败者逻辑曾被日本社会引以为荣。但是，随着“摆脱战败”^⑤的加速演进，日本不再甘于接受败者逻辑，反而视其为一种“不正常的经验”。当败者逻辑被揶揄与否定之时，也就是日本不再以战败省思作为思考问题的出发点之时。据此，日本企图召唤一种更加“普通”的防卫观念。

① 「第48回国会 衆議院 予算委員会 第10号」(発言番号100 岡田春夫)、1965年2月10日、<https://kokkai.ndl.go.jp/txt/104805261X01019650210/78>[2025-05-05]。

② 神谷万丈「日本の現実主義者のパワー観」、『国際安全保障』2012年第4号、66—80頁。

③ 大矢根聡「日本における『モーゲンソーとの対話』」、大矢根聡編『日本の国際関係論』、勁草書房、2016年、63—84頁。

④ 松元雅和「現実主義/平和主義理論における理想と現実」、『平和研究』第43巻、2014年、69—89頁。

⑤ 对“摆脱战败”更为详细的论述，参见张勇：《摆脱战败：日本外交战略转型的国内政治根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

历史是安全观念与战略思维的最大养料，因此日本战略精英们开始沿着历史的发展轨迹向上追溯，“利益线”思维也就得以改头换面、再度复活。

日本防卫研究所战史研究中心国际冲突史研究室主任千千和泰明，继承了山县有朋与井上毅的观点，提出所谓的“远东 1905 年体制”。即，以 1905 年为界，“日本、朝鲜半岛（至少是南部）、中国台湾地区，在权力政治的作用下，编组成为同一集群”。“远东 1905 年体制”保障了日本安全，防止了远东地区产生力量真空继而引发地区纷争。在他看来，二战后美国代替帝国主义日本，接手了该体制。^① 不难发现，其对日本防卫安全的认知，并非基于二战后形成的“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也不以 1947 年颁布的日本“和平宪法”为思维原点，而是上溯至 19 世纪的地缘政治思维。日本战略界中出现返祖思维可见一斑。在返祖的“利益线”思维驱动下，日本加速打造政治军事大国。这集中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2015 年日本战败 70 周年之际发表的“安倍谈话”宣称，“不能让与战争毫无关系的子孙后代担负起继续道歉的宿命”^②，力图为败者逻辑“打上休止符”。在这样的认知下，“安倍路线”推行法理突破，试图以程序正义代替实质正义，从而向国际社会做出形式上的保证，试图展现“和平国家”仍在延续的表象。但实际上，信奉武力、以武力威慑求安全的逻辑，早已贯穿在日本战略思维之中。

第二，日本以所谓“中国威胁论”为幌子，为自身的扩张性地缘政治思想寻求辩护，而干涉台湾问题是日本“安全扩张”的重要考量。在日本看来，其一，“台湾有事”应被纳入日本的国家安全与国家战略轨道之中；其二，武力威慑是最有效的安全手段。2021 年 4 月 16 日，美国时任总统拜登和日本时任首相菅义伟联合发布《日美首脑联合声明》，复活了已尘封 52 年之久的“台湾条款”，构成了所谓的“新台湾条款”。该声明宣称，“日美两国强调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敦促和平解决两岸问题”。^③ 安倍曾为菅义伟内阁助阵

① 千千和泰明『日米同盟の地政学—「5つの死角」を問い直す—』、新潮社、2024 年、38—50 頁。

② 《安倍晋三内阁总理大臣谈话》，日本国驻华大使馆网，2015 年 8 月 14 日，https://www.cn.emb-japan.go.jp/itpr_zh/bunken_2015danwa.html [2025-09-15]。

③ 外務省「日米首脳共同声明『新たな時代における日米グローバル・パートナーシップ』」、2021 年 4 月 16 日、<https://www.mofa.go.jp/files/100181507.pdf> [2025-10-24]。

鼓吹，公开宣称“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即日美同盟有事”。^① 岸田文雄则炮制“乌克兰之喻”，撰文指出“今日之乌克兰或将成为明日之东亚”。^② 石破茂也在美国哈德逊研究所投稿呼应岸田，其指出“今日之乌克兰、明日之东亚”，因而要“创设亚洲版北约以有效威慑中国”。^③ 高市早苗更亦步亦趋、愈加挑衅，将“存亡危机事态”与“台湾有事”勾连起来。^④ 更有甚者，自民党联合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高调支持“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之论调，并声称要“缔结美日澳菲四海同盟”以抗衡中国。^⑤ 不难发现，上述认知与山县有朋的“利益线”主张如出一辙。扩张主义、势力范围的思维，再度显现于日本防卫安全观念之中。

另一方面，在日本摆脱败者逻辑过程中，战后对日单独占领的美国在很大程度上扮演着纵容者角色。在美国看来，日本的安全战略理应被纳入本国战略轨道之中。因此，在日本否定败者逻辑的关键阶段，美国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助推作用。一是美国在事实上制造了“雅尔塔体系”与“旧金山体系”的乖离，形塑了日本错误认知的历史根基。出于冷战和阵营对抗的考量，美国安排部分国家同日本单独媾和，^⑥ 缔结了私相授受的“旧金山和约”。该和约把中国等战胜国排除在外，使得日本奉“旧金山体系”为“正朔”，对战后秩序产生错误认知。二是美国为应对朝鲜战争，在对日执行非军事化、民主化改革等方针时大打折扣，^⑦ 令日本对战争的反省既不全面、也不彻底。三是出于对华战略竞争的需要，美国敦促日本实质性强军，以更好地服务于自身战略需求。特朗普第一任期国家安全委员会解密文件《美国印太战略框架》规定，“赋能日本，使之成为印太安全框架中的一体化、

① 「『台湾有事は日本有事』安倍元首相が台湾のシンボでオンライン講演」、『朝日新聞』2021年12月1日、<https://www.asahi.com/articles/ASPD15JM0PD1UHBI01K.html> [2025-10-24]。

② 岸田文雄「『法の支配』に基づく国際秩序を守り抜く」、『外交』第78巻、2023年、6頁。

③ 石破茂「日本外交の将来」、ハドソン研究所、2024年9月25日、<https://www.hudson.org/politics-government/shigeru-ishiba-japans-new-security-era-future-japans-foreign-policy> [2025-10-24]。

④ 「高市首相の台湾をめぐる発言、なぜ中国を怒らせたのか」、『BBC News Japan』2025年11月12日、<https://www.bbc.com/japanese/articles/c4gpy0j0rqgo> [2025-11-26]。

⑤ 日本維新会『21世紀の国防構想と憲法改正』、2025年9月18日、<https://o-ishin.jp/news/2025/images/fb6c1d44a679a512165021651f6f62f12d52755.pdf> [2025-10-21]。

⑥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课题组：《日本与国际秩序变革：观念与应对》，《日本学刊》2021年第1期，第1—32页。

⑦ 约翰·W. 道尔：《拥抱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胡博译，北京：生活·新知·读书三联书店，2015年，第513—519、537—538页。

技术先进型支柱”，亦明确指出美国要“协助自卫队进行现代化建设”。^①可见，在自身战略需求的推动下，美国不断推动日本摆脱败者逻辑，强化军力建设。

总而言之，自“安倍路线”确立以来，在日本防卫安全观之中，法理规制与自我束缚严重异化。一个更深层次的动因是，日本尝试挣脱败者逻辑。在高市早苗治下的日本，败者逻辑下的战略经验是一种战略上的“不正常”“不普通”。而日本所追求的恰恰与此相反，是成为一个“普通国家”。高市早苗政府谋求的“普通”，是政治军事大国的代名词。因此可以说，“普通国家”还潜藏着一层观念上的含义，即找回“普通”与“正常”的战略思维与防卫安全观。也就是说，当不正常的战略思维指向了败者逻辑，那么日本就在其历史脉络中向上追寻“正常”的战略思维。由此，“利益线”的防卫安全观呼之欲出。于是，一个山县有朋式思维的日本也就回来了。

四、结 语

在安倍晋三领导下，日本确立了对此后几届内阁均影响至深的“安倍路线”，明言日本不做“二流国家”（Tier - two country）^②。这一路线的深层含义在于，日本理应积极主动地塑造国际秩序。^③ 安倍的言外之意是，日本长期以来奉行的外交与安全政策过于消极、低效，是一条需要摒弃的路线。他主张日本的安全应当摆脱战败国思维，为此需要推动自卫队“普通化”。“普通”成为日本谋求政治军事大国地位、复活“利益线”扩张主义思维的代名词。

安倍再度执政以后，日本在安全观念上加速挣脱败者逻辑。威胁指涉的向外转移，是否认败者逻辑的重要体现，在具体层面上则意味着法理突破与军力束缚解禁。一是出台“新安保法制”、掏空法理束缚，打造“无缝式安保法律体系”，服务军事任务。日本借助法理突破，转移“举证责任”，使自卫

①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US Strategic Framework of The Indo - Pacific”, January 2021, <https://trumpwhitehouse.archives.gov/wp-content/uploads/2021/01/IPS-Final-Declass.pdf> [2025 - 06 - 15].

② “Japan Is Back: Policy Speech by Prime Minister Shinzo Abe at th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 February 22, 2013, https://japan.kantei.go.jp/96_abe/statement/201302/22speech_e.html [2025 - 10 - 14].

③ Christopher W. Hughes, Alessio Patalano and Robert Ward, “Japan’s Grand Strategy: The Abe Era and Its Aftermath”, *Survival*, Vol. 63, No. 1, 2021, pp. 125 - 159.

队行使武力获得法律依据，以程序正义代替实质正义。二是解禁军力限制、强化自卫队力量、打造“安保监护人”形象。三是暗自复活“利益线”思维，将中国台湾地区纳入其“利益线”之中。高市早苗更公然声称“台湾有事”涉及日本“存亡危机”，严重挑衅中国主权安全。

另一方面，败者逻辑还遭到来自战略派们的挑战。无论是均势思维，还是所谓“远东1905年体制”，抑或“安倍大战略”，皆试图找回军事、带回武力，^①也都是“利益线”脉络下的安全思维。这代表着，日本的防卫安全观念以“普通化”挑战“败者逻辑”。必须指出的是，“普通”绝不意味着“类似”，而是观念上的“返祖”。当扎根于历史镜鉴的“和平主义”防卫安全观被认为“非普通”并贴上消极标签之时，日本企图在历史脉络中向上寻找，重新召唤其所推崇的“普通”与“正常”的安全思维。在“普通”与“安全”的大旗下，“利益线”、武力崇拜的思维就暗自逐步回潮。

对此，国际社会理应清醒认识到，日本语境中的“普通”绝非一般意义上的“普通国家”。一个“普通”的日本，是一个复活扩张主义糟粕的日本。一个“普通”的日本，是整军经武的新型“军国主义”日本。一个“普通”的日本，更是一个尊奉山县有朋式思维的日本。值此历史的分水岭，国际社会理应携手维护战后国际秩序，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共同警惕日本走上返祖歧路。

（责任编辑：陈梦莉）

^① 岩田清文·武居智久·尾上定正·兼原信克『自衛隊最高幹部が語る令和の国防』、新潮社、2021年、54—60頁。

and heightens the potential risk of further political rightward drift. Given that the ruling Liberal Democratic Party's support base has already been significantly eroded by the expansion of opposition forces, whether the current fragmentation of the opposition will evolve into a broader pattern of party system fragmentation including the ruling party itself has become a critical issue in the study of contemporary Japanese politics.

An Analysis of Japan's Economic Security Strategy under the New Strategic Environment

Cui Jian and Zhang Zhongyi

Since 2020, Japan's economic security strategy, incorporating new ideas such as strategic autonomy and strategic indispensability, has gradually taken shape. At the same time, economic security has become deeply embedded in Japan's overall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A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is strategy has progressed, its agency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evident. First, Japan's economic security strategy demonstrates a proactive orientation even when framed in defensive terms. This is particularly evident in the evolution of strategic thinking and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as well as in industrial policy design and corporate management practices. Second, Japan's economic security strategy contains elements of offensiveness within a broader context of strategic competition. In practice, policy measures with offensive characteristics have emerged across multiple domains.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wo of the most prominent areas: the exploration of more effective use of economic coercive instruments such as export controls, and the growing emphasis on cultivating cutting-edge technologies that enhance strategic indispensability. The strengthening of agency in Japan's economic security strategy is driven primarily by changes in Japan's domestic political environment and fundamental shifts in its national and economic security strategies. In addition, the broader international context, marked by the increasing salience of economic security and the policy approaches adopted by major actors such a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uropean Union, has also exerted significant influence.

The Logic of the Defeated: Japan's Defense and Security Perceptions in a State of Alienation

Zhang Yong and Meng Fanchao

As both the initiator of external aggression and a defeated power, postwar Japan has developed defense and security ideas with characteristics markedly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other states. These characteristics are concentrated in what this article calls a "loser's logic", a trajectory that moves from embracing defeat to seeking to overcome it. Driven by apprehension about the potential "loss of control" of military power, Japanese society has long been more concerned with "internal threats", generating a self-restraining security outlook. On the one hand, Japan has emphasized juridical regulation, displaying an approach akin to "no action without legal authorization". On the other hand, the question of how to constrain the Self-Defense Forces has constituted a central proposi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Japan's defense and security architecture. As threat perceptions have shifted from the internal to the external, responding to "external threats" has come to be treated as the foremost concern. The loser's logic, grounded in historical lessons, has been increasingly challenged by proponents of Japan as a "normal country", and is no longer regarded as an unquestionable guiding principle for Japan's defense and security policy. Particularly under the "Abe line," the notion of a "normal country" has been associated with the pursuit of great-

の「野党分断化」がさらに自由民主党などを含む「政党の分断化」へと発展するかどうかは、日本政治研究が直面する重要な課題となっている。

新たな情勢下における日本の経済安全保障戦略の能動性分析

崔 健 張 鐘芸

2020 年以降、戦略的自律性や戦略的不可欠性といった新たな理念を体現する日本の経済安全保障戦略が徐々に形成され、経済安全保障は同国の国家安全保障戦略に深く組み込まれるようになった。経済安全保障戦略の実施が進むにつれ、その能動性はいつそう際立っている。まず、日本の経済安全保障戦略は、防御的枠組みのなかで主体性が見られる。これは、戦略思想の進化や制度整備、産業政策、企業経営理念などの面においてとりわけ顕著である。次に、日本の経済安全保障戦略には、対抗局面における攻撃的要素が内包されている。経済安全保障戦略の実施のなかで、ある程度の攻撃的色彩を帯びた政策措置は多方面で見られるが、本稿は以下の最も顕著な二点に焦点を当てる。一つは、輸出管理を含む経済制裁措置の効果的活用の模索であり、もう一つは、不可欠な先端技術の育成を一層重視する姿勢である。日本が経済安全保障戦略の能動性を強化する内的要因としては、主として国内の政治状況の変化と、国家安全保障及び経済安全保障戦略の根本的転換が挙げられる。同時に、経済安全保障が広く重視される時代的潮流、米欧など主要国・地域の取り組みも、日本に重要な影響を与えている。

敗者の論理：変質された日本の防衛安全保障観

張 勇 孟 繁超

現在、日本の防衛安全保障観は著しい変容を遂げており、その根底には戦後長らく支配的であった「敗者の論理」の動揺が浮き彫りになった。「敗者の論理」は、敗戦を抱える状態から敗戦からの脱却へとシフトする。侵略者にして敗戦国であった日本は、第二次世界大戦後の一定期間において、他国とは一線を画す独自の防衛安全保障観を形成してきた。その特徴は、軍事力の「暴走」への深い懸念に基づき、「外部脅威」よりもむしろ「内部脅威」に対する警戒を優先するという、自己拘束的な安全保障観にあった。具体的には、法的規制を重視し、「法律の授權なければ行えない」という原則が貫かれていた。また、自衛隊の活動をいかに制限や統制をするのが、防衛問題の中心的命題とされてきた。しかしながら、日本社会における脅威認識は「ウチ」から「ソト」へとシフトし、「外部脅威」への対応が最優先課題として浮上するに至った。このような変化の中で、歴史的教訓に基づく「敗者の論理」は、「普通の国」への志向を掲げる勢力によって再解釈されて、その規範的地位は相対化されつつある。とりわけ「安倍路線」の下では、「普通の国」とは単なる国際的平等の回復ではなく、むしろ政治的・軍事的な大国化を志向する概念として定義づけられている。このような流れのなかで、日本の防衛安全保障観は急速に「普通化」へと向かい、執行部の中も歴史の中に軍事強国